

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

王姬鑫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要：社交媒体是Web2.0时代的代表产物，社交媒体的出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提供了个人表达的平台，也成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国内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对社交媒体的概念进行阐释，社交媒体具有实时性、互动性、精准性和开放性等特性。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参与的概念逐步扩展，在互联网时代下政治参与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政治参与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政治认知、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共同构成了政治参与的逻辑链条。基于政治参与的逻辑链条，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对政治认知的塑造、对政治表达的影响和对政治行动的协调，并且这些具体作用呈现出积极和消极两种倾向。

关键词：社交媒体；政治参与；政治认知；政治表达；政治行动

DOI: 10.69979/3041-0673.24.10.011

社交媒体是Web2.0时代的代表产物，社交媒体的出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提供了个人表达的平台，也成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意见、参与讨论，进而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政治参与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重新解构了政治参与的内在逻辑，并基于Web2.0时代下社交媒体的特性优势，探讨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

1 社交媒体的概念和特性

“社交媒体”这一概念最早由安东尼·梅菲尔德在《What is Social Media》一书中提出，特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并具有参与、开放、交流、社区化、连通性等特征的网络媒介^[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也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对社交媒体的概念进行阐释，以求更全面地勾勒出社交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画像。安德烈·开普勒和迈克尔·亨莱因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它们允许用户通过内容生成和交换来彼此之间进行社交互动^[2]。国内学者陈力丹指出，在互联网所引导的媒介生态下，人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单元，每一个用户作为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具有信息发布和信息获取的双重功能，都可能对整个网络施加自己的影响^[3]。胡泳则认为，互联网正在进入社交媒体不断精准化的时期，“精”意味着社交媒体不断精致化所造成的

信息碎片，而“准”则是通过使用大数据分析和标签功能，准确地将信息和受众联系在一起^[4]。苏涛等提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微信、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进行信息获取、风险感知、情绪纾解的主渠道，而社会公众由此也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交媒体依赖”，在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同时，情绪的传播和对风险的感知也成为一种常态^[5]。

基于社交媒体的概念综述，本文将社交媒体的特性概括为实时性、互动性、精准性和开放性。首先，社交媒体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使事件的发生和信息的传播基本达到同步，同时让用户能够实时接收并反馈信息，这种实时性大大降低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其次，社交媒体可以通过点赞、分享、评论、回复、私信沟通、群组或论坛沟通、直播等功能实现用户之间以及用户和内容之间的直接交流互动，这种互动性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方式。再次，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行为和偏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此外还通过用户的数据来定位广告，使广告更精准地投放至目标受众，通过精准的内容推荐和广告定位，社交媒体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提高用户粘性，也为广告商提供有效的推广渠道。最后，社交媒体具有开放性，每一位用户都可以提出、批判或反对某种观点，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和语言障碍与其他国家的用户进行交流和互动。此外社交媒体平台通常提供开放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允许

第三方开发者创建和使用这些平台的功能和服务,这使得社交媒体平台能够与其他应用和服务集成,为用户提供更加开放的功能和体验。

2 政治参与的再认识

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参与的概念逐步扩展,范围逐步扩大,形式逐步丰富,影响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政治参与的阐释各有侧重,本文从政治参与主体的视角出发,梳理了政治参与的内在逻辑链条,为后续分析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

2.1 政治参与概念的扩展

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政治学说,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思想是源自于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人民权利的思想。政治参与的早期研究集中于选举学或选举行为的各种解释,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政治社会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政治参与的研究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6]207-208}。由于分析和观察政治参与行为的角度各有侧重,不同学者对政治参与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德尼·维巴和诺曼·奈伊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民众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行动为直接目的而采取的合法行为,而各种非制度性、非法的政治行为则不被视为政治参与^{[7]44-81}。萨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进一步扩展了政治参与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8]5-12},即暴力行为和违法行为也被纳入政治参与的范畴。

上述几位学者主要从行为视角来解释政治参与,而帕特里克·J·孔奇在研究政治参与的诸多概念界定后提出了关于政治参与的争议问题之一,即政治参与是否应当仅从行为上来解释,如选举、政党竞选等积极行动,还是也包括其被动形成,如爱国主义感情、对政治问题的敏感性等消极或隐性态度。基于孔奇提出的问题,部分学者主张态度、情感、认知等主观成分应归入政治参与范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认为,政治文化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在塑造公民的政治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被视为政治参与的一部分^{[9]71-213}。这些学者在研究客观政治参与行为的基础上,主张将主观成分也纳入政治参与范畴,进一步扩展了政

治参与的概念。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治参与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政治参与的新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网民及虚拟团体;网络政治参与不仅指向国家政权系统和重大政治决策,也会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更加直接化和技术化^[10]。网络政治参与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政治参与在地域和时间上的局限性,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深化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另一方面提供了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便捷多样的参与方式,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丰富了政治参与的渠道。

2.2 政治参与的内在逻辑

不同学者对于政治参与的解析基于不同的视角,本文认为对政治参与的阐释离不开政治参与的主体,由于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人,不能将人的主观认知和客观行为割裂开来,因而主观因素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参与的内在逻辑符合人由认知到行动的完整逻辑。

政治认知是公民对政治信息的接收、处理和解释,包括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角色等客观存在的认识和理解。政治认知是政治参与的逻辑起点,只有当公民对政治体系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到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时,才可能产生参与政治的愿望和动机。

政治表达是公民通过语言、文字、艺术或其他形式公开表达政治观点、态度、情感或立场。政治表达是政治认知的外化,公民通过一系列外显的形式表达政治见解,提出政治诉求,并将个人的政治理解传达给他人,对公众和政治决策者产生影响。同时政治表达也是公民监督政府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

政治行动是公民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投票、选举、主动接触、政治结社等。政治行动是政治表达的实践,旨在实现政治表达中提出的目标或愿景。政治行动是政治参与的逻辑终点,所有主观层面的见解都要通过实际的政治行动才能落地实施。政治行动直接作用于政治系统,是政治参与的关键步骤。

政治认知、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共同构成了政治参与的逻辑链条,这三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公民政治参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3 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

基于政治参与的逻辑链条,本文将分别阐述社交媒体在政治认知、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这三个环节发挥的作用,进而厘清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

3.1 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塑造

社交媒体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快速便捷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快速获取大量政治信息,这些广泛且实时的政治信息为公众政治认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社交媒体上用户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政治观点的多元化,用户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多元化的政治观点,有助于形成更全面的政治认知。

传播学中有一经典理论即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主张媒介通过调整报道顺序和频率、选择报道内容和角度等方式影响公众的关注点和认知。当前微博、抖音、快手、B站等各类社交媒体都设置了“热搜”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热搜榜单迅速了解当前受到大众广泛关注的政治话题。热搜榜单的内容和排序方式直接决定了社交媒体用户看到的政治话题与热度排行,因此热搜榜单实际上对公众引导了一种特定的议程设置,定义了人们对政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11],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众的政治认知。

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信息量巨大且来源多样,一些谣言和虚假信息也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这些谣言和虚假信息可能会歪曲公众的政治认知,影响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正确判断。此外,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算法往往会根据用户的兴趣推送相关政治信息,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在信息茧房内相似的观点和信息被不断重复和强化,不同的观点和信息被排除在外,容易导致公众政治认知的偏差。

3.2 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表达的影响

社交媒体技术的运用降低了公民政治表达的成本,公民可以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进行更为便捷的线上交流。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包容度降低了政治表达的门槛,在传统媒体中缺乏代表性的弱势群体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了更加平等的表达机会。社交媒体的匿名功能使公民更加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观点和诉求,来自不同背景的公民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多元化的政治表达。社交媒体的互动功能使政府机构和公民能够进行双向交流,政府机构能及时听到公民的声音,公民能及时看到政府机构的反馈,公民政治表达的效率得以提升。

但社交媒体并非总能促进公民的政治表达,有学者基于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提出的“沉默螺旋”假说来阐释社交媒体对政治表达的抑制作用。

“沉默螺旋”假说是指个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会受到周围意见气候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派,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被孤立而选择沉默。这个过程会导致一种“螺旋”效应,即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弱,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强,从而形成一种主导舆论。陈力丹等学者就此指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移动网络传播强调人际关系,即通过一定的传播技术帮助用户找到自己想找的“熟人”,信息在这些“熟人”之间传播。这种“熟人圈”的人际传播特点在于引发传播的各方保持相互关注或保持好友关系,而非破坏这种关系。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态度表达,包括官方账号发布的信息、舆论领袖的发言、普通用户的观点等,形成了意见气候。在意见气候的无形压力下,普通用户感知自己的观点与被感知的多数意见一致时则倾向于表达,反之会因为担心打破与熟人圈或准熟人圈的平衡和友好关系而保持沉默,甚至向相反观点妥协^[12]。

3.3 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行动的协调

社交媒体可以迅速传播政治倡议和活动信息,动员公民参与各类政治行动。不少国外学者研究社交媒体在政治选举中的应用,指出社交媒体能用来征集选票、宣传竞选人的政治主张、促进政客与选民的沟通等,不仅改变了候选人的竞选方式,也改变了选民的参与方式,助推了政治选举的进程。此外,社交媒体为政治行动提供了网络化的组织工具,使得分散的个体和组织能够更容易地合作和协调行动,社交媒体跨越了地理界限,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

然而,基于社交媒体所发起的公民集体行动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首先,社交媒体上的参与者流动性较大,他们可能随时加入或退出行动,使得行动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其次,社交媒体上的集体行动缺乏传统组织结构的支持,如有力的领导核心、明确的分工安排、合理的资源管理等,这些可能导致行动的无序和效率低下;再次,社交媒体上的参与者可能因网络环境下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互动而缺乏真实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导致行动的脆弱性。

4 结语

政治认知、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共同构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逻辑链条。这一逻辑链条体现了公民从对政治现象的感知和理解,再到通过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来影响政治体系和社会现实的过程。基于这一逻辑链条来解释政治参与,不仅有助于厘清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而且为进一步分析社交媒体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框架。

通过解析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逻辑链条中每个环节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呈现出两种倾向: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从积极层面上说,社交媒体打破了政治信息传播的时空壁垒,拓展了政治信息传播的维度。社交媒体能够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是公民表达诉求、释放“动议”、组织行动的重要工具。从消极层面上说,社交媒体可能会歪曲公民的政治认知,催生负面或极端的政治情绪,抑制公民的政治表达,影响集体政治行动的效率等。

为了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减轻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政府、公民和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共同努力。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发布权威、真实的政治信息,与权威媒体、学术机构等合作,对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进行认证,确保公民能够获取到准确的政治动态和政策解读;完善对社交媒体进行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故意传播虚假政治信息、煽动负面政治情绪等行为进行严格整治。公民应自觉维护社交媒体的健康秩序,正确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互动,提高政治素养和参与能力。社交媒体平台应加强对政治信息的审核和过滤,建立健全信息监管机制,提升平台的技术防护能力以保障信息安全。

参考文献

[1]Antony Mayfield.What is Social Media[EB/OL].
<https://www.antonymayfield.com/> 2006/09/27/soc

ial-media-ebook/comment-page-1/,2006-09-27.

[2]Andreas M.Kaplan,Michael Haenlein.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J].Business Horizons,2010 (1):59-68.

[3]陈力丹.互联网重新定义了媒体[J].青年记者,2016(5):58-60.

[4]胡泳.社交媒体的精准化信息传播[J].对外传播,2015(4):62-64.

[5]苏涛,彭兰.虚实混融、人机互动及平台社会趋势下的人与媒介——2021年新媒体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22(1):44-60.

[6]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7]Verba S,Nie N.Participation in America[M].Lexington Books,1972.

[8]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10]宋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综述[J].理论学刊,2012(6):104-108.

[11]余绪鹏.“热搜政治”:数字媒体时代的政治形态[J].宁夏社会科学,2023(6):69-78.

[12]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J].编辑之友,2015(5),5-10.

作者简介:王嫒鑫(1992年10月),女,汉族,山西省运城市,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政治学理论。